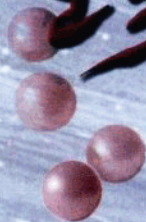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史海拾珍

SHIHAISHIZHEN



浙江人民出版社

前 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浙江文史资料第74辑——《史海拾珍》，是由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又一本浙江近现代综合史料专辑。

本书的主要特点：一是时间跨度较大。所刊史料记述了自清末至今100多年来，有关浙江籍或在浙江工作、生活过的一些近现代名人的生平或事迹片断。二是涉及的人物较多。其中既有中共老一辈领导人，也有民国元老；既有学界泰斗和艺术大师，也有科研群体和学术新秀；既有大陆的知名人士，也有香港、台湾的各界名流；既有知名度很高的大家，也有尚不太为人熟知的人物。三是涵盖的领域较广。凡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艺术、体育等领域的人和事都或多或少有所涉及。

本书的文章作者，有曾任各级领导的老同志，有著名的专家学者，有长期从事政协文史工作的“老文史”，也有酷爱文史的热心撰稿人，他们所写的文章大都是其“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史料。曾任中共浙江省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的陈法文所撰《通过信访渠道 促进政策落实》一文，通过对粉碎“四人帮”之后，浙江省委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重视信访工作，促进政策落实情况的回顾，既为人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也为我们今天建设“平安浙江”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借鉴。《浙江日报》社的老新闻工作者张金庄，在其所撰《周恩来总理1957年在杭州的两次讲话》中，记述了自己作为1957年周恩来总理在杭州先后两次讲话的记录整理者的亲身经历，史料弥足珍贵。曾任绍兴市政协副主

席的陈惟于撰写的《双飞共进为乡国——记香港大律师胡鸿烈博士》，记述了原全国政协常委、绍兴籍的香港大律师胡鸿烈博士的成才之路，及其爱国爱乡、为香港的回归作出贡献的业绩；曾任浙江省政协委员的韦俊世的《王惕吾的中国心与两岸情》，记述了其东阳同乡——台湾报业大王王惕吾先生爱国爱乡，捐赠巨款支援家乡建设，为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和祖国的统一大业而不懈努力的事迹。此两文则堪称是颇具统战特色的“三亲”史料。著名作家、全国政协委员叶文玲的《桂子香年年——追忆越剧艺术大师尹桂芳》，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艾青研究专家骆寒超教授的《忆诗学大师艾青》，中国美院教授卢炘的《潘天寿——20世纪中国画坛的杰出代表》，均属大家手笔，不仅文采斐然，而且史料价值也甚高。省政府参事孟丙南的《乔司情结——省“五七”干校亲历记》，则是一篇珍贵的“文革”亲历史料。

本书除收录“三亲”史料外，也刊用了一些有特色的研究性史料文章。杭州师范学院“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主任陈星所撰《弘一大师杭州行迹》一文，就是一篇融学术性与可读性为一体的很有价值的研究性史料。《民国奇人张静江轶闻》，虽然是由苏殿远参考旧史料编写而成的，但作者从旧史料中发掘出了不少新意，这对于丰富文史资料的内涵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俞泽民的《俞同奎先生传略》，则是以年谱的方式略述浙江籍的中国现代化学教育开拓者和文博专家俞同奎先生的生平与业绩的。朱真葵所撰的《水稻“南繁”育种四十年见闻》，记述了尚不太为人们熟知的科研群体——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新老两代科研人员，40年薪火相传，为浙江水稻科学育种事业的发展而历尽艰辛、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纳米技术研究的领先者——汤子康》一文，记述了从武义农村走出来的青年科学家汤子康博士的

成才之路,及其在国际高科技——纳米技术研究领域所作的贡献。本书收录的所有文章,尽管体裁不同,文风有别,但所能起到的“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作用却是共同的。

本书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记述生动,文采纷呈。书中记载的不少人和事,对于增进人们对浙江乃至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状况的了解无疑都是十分有益的;尤其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风范,著名书画艺术家为繁荣和发展新中国的文化艺术事业所作的贡献,港、台知名人士的爱国爱乡精神,科技工作者的无私奉献精神等,对于浙江乃至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则更具积极的借鉴和促进作用。本书限于篇幅,有关浙江籍近现代名人的史料收录尚不太多,征编更多这方面的史料,尤其是现当代浙江籍名人史料,当是我们今后的努力目标。

限于编者水平,本书疏漏、舛错之处恐尚难免,祈望方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编 者
2004 年 8 月

目 录

周恩来总理 1957 年在杭州的两次讲话

..... 张金庄〔1〕

通过信访渠道 促进政策落实 陈法文〔7〕

霍士廉同志与浙江统战工作 韦俊世〔12〕

献身真理 光耀千秋

——缅怀敬爱的父亲华岗 华景杭〔19〕

我的渔民情结 姚德隆〔34〕

瑞安塘下区实行公社干部不脱产试验始末

..... 周士味〔41〕

马一浮先生与故乡先贤的交往 何信恩〔57〕

弘一大师杭州行迹 陈 星〔61〕

忆诗学大师艾青 骆寒超〔87〕

潘天寿——20 世纪中国画坛的杰出代表

..... 卢 炯〔100〕

叶浅予《富春山居新图》创作记 刘 兵〔112〕

常书鸿和常书鸿美术馆 蔡 琴〔120〕

陆俨少情系桐庐故乡行 刘 兵〔133〕

忆著名文博专家、书画家酆承铨教授 徐润芝〔139〕

记潘韵艺术生涯中的两个创作高峰 朱馥生〔148〕

沈迈士的人品作品	钱 朴[163]
“不雕”的“春泥”	
——吴高清先生写意	王 凌[170]
飞旋的神笔	
——记工艺美术大师吴子熊	赵 征[177]
创造京剧辉煌的麒派艺术	
——周信芳的生平和麒派艺术的特色	
.....	任明耀[188]
桂子香年年	
——追忆越剧艺术大师尹桂芳	叶文玲[208]
张翼鹏在南京演出轶事	彭兆荣[240]
重教助学 泽及千秋	
——船王包玉刚和宁波大学	唐德中[246]
双飞共进为乡国	
——记香港大律师胡鸿烈博士	陈惟予[256]
王惕吾的中国心与两岸乡亲情	韦俊世[262]
爱国实业家查济民	陈启文[268]
爱国教育家马临	戴光中[278]
谁怜爱国千行泪	
——记爱国港商庄保庆先生的传奇经历	
.....	刘晓伟[294]
邹氏兄妹与家乡公益事业	朱 炜[303]

奉港联谊架桥人——王剑伟先生	王舜祁〔309〕
记热心公益事业的香港大业炽造厂	
董事长沈炳麟	周添成〔313〕
民国奇人张静江轶闻	苏殿远〔316〕
重修陈英士墓纪实	邱鸿炘〔327〕
虎口余生	
——策反胡宗南经过	孟丙南〔333〕
俞同奎先生传略	俞泽民〔365〕
王文熙传略	解莉华〔378〕
灵隐寺首任住持慧明法师传奇	陈浩望〔384〕
张同泰国药号及其传人张鲁庵	劳志鹏〔391〕
情系泰清	
——记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	苏锦炎〔394〕
记两届奥运会举重冠军占旭刚	巨 文〔418〕
纳米技术研究的领先者——汤子康	
.....	周子恒 余依明〔428〕
乔司情结	
——省“五七”干校亲历记	孟丙南〔434〕
水稻“南繁”育种四十年见闻	朱真葵〔442〕
省文物商店工作的回顾	董其伟〔452〕
“文革”期间抢救古籍亲历记	何槐昌〔461〕

周恩来总理 1957 年在杭州的两次讲话

张金庄

周恩来总理曾于 1957 年 3 月下旬和 4 月下旬两次来到杭州，并先后于 3 月 24 日和 4 月 24 日在杭州人民大会堂发表了两次重要讲话。我是周总理这两次讲话的记录和整理者，这也是我记者生涯中最为难忘的经历之一。

1957 年 3 月 21 日，周恩来总理为接待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专程从北京来到杭州。下午，西罗基乘专机到达杭州。周总理作为主人，比西罗基提前一点时间到达杭州机场，然后在停机坪上迎接这位来自东欧的客人。3 月 23 日下午，西罗基离开杭州去上海，周总理又在杭州机场为他送行。第二天，即 3 月 24 日，周总理就在杭州人民大会堂广场上，向来自全省各地的干部一万余人作了杭州解放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公开讲话。

我没有参加西罗基总理来杭的采访活动。但就在这次外事活动期间，浙江日报总编辑于冠西同志单独找了我，嘱咐我作好准备，将去参加一次会议做记录。他要求我把会上的讲话全部记录下来，会后整理成文，并说这是省委领导布置的任务。当时我们一般都使用自来水笔，有时因参加外事活动采访，需要边走边记，我也随带一支粗芯铅笔（那时还很少有人使用圆珠笔）。这次，我预感到任务一定很重要，就在事先削好了几支铅笔备用。3 月 23 日上午，我按照总编辑的要求，骑着自行车赶到杭州饭店负责外事接待的临时办公室。到了那里后，于冠西同志告诉我：“今天的任务取消了，你先回去吧！”事后，一位外事部门

的同志告诉我，中捷两国总理曾临时决定在杭州举行一次会谈，要求省里派人担任记录。后来捷方提出改为两国总理私下会谈，只允许一位翻译在场，并且不作记录，不发消息，所以其他人员都不参加了。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我党连续发表了两篇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重要文章（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中捷两国总理的会谈，必然会涉及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其他工作人员不宜参加，是很自然的。

当天下午，于冠西同志再次通知我，第二天周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仍旧由我去做记录。

万人大会在杭州市人民大会堂前的广场上举行，来自省级机关、杭州市及从各地区赶来的机关干部，都按事先划定的方阵有秩序地坐在草坪上。大会主席台设在人民大会堂大厅门口的台阶平台上，正中间放置着一张从大会堂内主席台上搬来的讲台。讲台的左侧摆着一张普通的办公桌，这就是我的记录席。此外，主席台上没有别的桌椅和摆设。主持会议的沙文汉省长在开始时作了简短的讲话后，就退到后面的休息室去了。周总理讲话时，没有讲稿，讲话内容主要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我现在留在脑子里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是，总理提到不久前刚刚访问过苏联、波兰等一些国家（当时没有公开报道），他很具体地讲到苏联、波兰等国的一些情况，例如苏联的部长每月的工资一般为多少卢布，而苏联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却只有多少卢布，两者相差有好多倍。波兰则不同，他们的部长每月工资为多少兹罗提（波币名称），与一个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相比，差距要小得多。总理的意思是：领导干部和普通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不能太大。过了很长时间

之后，我才逐渐理解到，总理这次讲话的整个内容，是阐述毛主席在1956年所讲的《论十大关系》的精神。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直到70年代才正式发表。

总理讲话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他出口成章，逻辑严密，很有条理，而且音调清晰，节奏也很均匀，非常好记。他那略带苏北口音的普通话，深深地印记在我脑子里，直到现在，每当电视里出现周总理的形象，我总要用存贮在脑子里的信息来对照电视演员的声调，从而辨别哪个讲得像，哪个相差比较远。总理讲话中间休息时，我曾走到讲台边看看，没有发现讲话提纲，他完全是一口气讲下来的。当他和沙文汉省长交谈时，我也站在旁边看着。当时他年近六十，但精神很好，面色红润，非常健康，两颊的络腮胡子尽管修刮得很干净，但青青的肤色仍看得很清楚。

参加这次大会的干部虽然只有万人左右，但实际上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广场四周马路上的群众，却也不下数千人，他们都是自发赶来一睹总理风采的。报告会结束之后，参加听讲的各地干部都听从指挥，有秩序地从会场东、南、西三面大门疏散出去，周总理则由沙文汉省长等陪同，进入人民大会堂，穿过舞台，从北门而出。总理的座车就停在大会堂的北门外。哪里知道，当周总理走出北门，坐进汽车之后，车子再也开不动了。柳莺路上早就有人在等候着，一瞬间，真是“人群如潮”，人们鼓掌欢迎，情绪极为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沙文汉省长只好再从车里出来，高声地劝说大家让开一条路来。沙省长人高马大，站在汽车旁边，足足高出人群一个头。他微笑着挥动双手，高声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总理已经作了半天报告，很吃力了，请大家让一让，让总理回去休息！”但是，人们不但不退，反而越聚越多，真可以说是水泄不通了。这使我想起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这次访问杭州时说的一句话：“人民总是欢迎自己的总理的！”因为每当周

总理陪同西罗基参观游览时，人们总是不断地朝着周总理鼓掌、欢呼！

沙文汉省长感到再这样下去是无法脱身的，他只好打开车门，请周总理下车，重新走入人民大会堂，另换了一辆汽车，从西门出去，回到了杭州饭店。

回到报社后，我花了近两天时间把周总理的报告整理成一万多字的草稿。后来知道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有一台钢丝录音机也录了音，我就又到电台对着录音机校对了一遍。那时的录音设备也是非常简陋的，放音时既不能停，也不能倒，音质又很不好，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放，一次又一次地校对、修改。不过，有了手记的草稿，加上录音的校对，相互参照，整理成的稿子就放心多了。这份记录稿经总编辑于冠西同志阅后转送给了省委办公厅薛驹同志。后来我看到的是一份中共浙江省委发出的正式文件。

一个月后的4月24日，周恩来总理又在杭州向两千多位党内外干部作了第二次讲话。

这一次，周总理是在杭州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并陪同他在杭访问的前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出席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和全省宣传工作会议的同志，作了题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讲话。

在回忆周总理这次讲话之前，我先把周总理在杭州笕桥机场同苏联朋友的一次谈话介绍如下：

(1957年)4月25日上午9时20分左右，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从上海来到杭州。在机场上，周总理和随同伏罗希洛夫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拉希多夫、高教部部长叶留金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博士畅谈了人民内部矛盾和反对官僚主义问题。拉希多夫对周总理说：“听说中国现在大力

反对官僚主义。”周总理说：“是的，昨天我还在这儿向两千多党内外干部作过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新的整风的报告。”“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而各种社会关系中领导和群众的矛盾也会突出。”“我们承认矛盾，检查缺点，区别处理方法，就可以不断地解决这些矛盾。”

在周总理和伏罗希洛夫来杭期间，我正在作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和全省宣传工作会议的采访工作。这两个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学习和贯彻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4月24日下午3时，周总理由江华同志陪同来到人民大会堂。这次讲话是在人民大会堂内大会议场里进行的。江华同志作了简短讲话后，请周总理作报告。我坐的记录台仍放置在主席台的右侧。周总理所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若干问题的解答》，共分六个部分：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问题提出的客观基础；二、新形势新任务；三、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性质、内容、转化及处理的方针；四、“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六、共产党内的整风。

这天因为会议开始已经是下午3时了，所以周总理讲话结束时已经超过了6点钟，天已开始暗了下来。讲话中间休息时，我走到讲台边看到讲台上放着几张用32开白色打字纸打印的讲话提纲，每张纸上打印一个问题，几个淡蓝色的字，打印在每张纸的正中，总理每讲完一个问题，就翻过一张纸，讲话的详细内容，则全部来自总理的脑子里。

周总理讲话结束后，趁总理还未离开，我急忙找到总理的外事秘书马列同志，同他商量有关报道问题。我问：总理今天的讲话，是详细整理发表还是只发表简短摘要的新闻？马列说：

你是不是先整理一篇比较详细的稿子，然后摘写一篇简要的新闻稿，各打印几份，明天送给我，我再请示总理。

按照马列同志的意见，我连夜整理了一篇约三四千字的讲话摘要，然后摘编了一篇千字左右的新闻稿，请排字车间的同志用比较大的字体各排印了10份，第二天上午送到杭州饭店五楼马列同志的住处。

因为参加两个会议的同志这天都参加欢迎伏罗希洛夫来杭访问的活动，我也接受了一点采访任务，并在杭州饭店等候马列同志的回音。但是直到周总理离开杭州，马列同志仍没有拿到这两篇送审稿。他对我说，看来这个报道不可能见报了，因为毛主席的两次讲话也还没有公开发表呢！因此，在5月1日《浙江日报》发表的两个会议结束的报道中，我只好在请示了林乎加书记、吕志先（宣传部）部长后，简单地写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向大会作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重要讲话”这样一句话，而必须严守纪律，不能写出具体的内容。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正是我们全党的谦虚谨慎、严守纪律的楷模。

作者简介：

张金庄，老新闻工作者，浙江日报社离休干部。

通过信访渠道 促进政策落实

陈法文

每当我看到成批群众到省里上访的情景,就不禁想起了上个世纪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通过信访渠道,促进政策落实的一些往事。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在我省积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全省共有7万多名干部受到了非法审查,占当时干部总数的23.8%,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我省制造的集团性冤案有1300余起,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达55万人,其中非正常死亡的近2000人,致伤致残的有1.2万多人。同时,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左”倾错误影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以及工作中的某些失误,也遗留了不少历史问题。因此,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有步骤地妥善处理建国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认真落实各项政策,就成为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创造前提条件的不可缺少的工作。

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是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单位的共同任务,而信访部门是一条重要的渠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展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逐步恢复和健全,广大干部和群众冲破“左”的阻力,要求落实政策的呼声很高,信访量急剧增加。全省受理的信访从过去每年约3万余件上升至12.4万多件,并出现了许多群体性和成批性问题的信访,以及大量的越级信访。在这期

间，我先后在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和省委担任领导职务，曾分管和分工联系信访与落实政策的工作。从信访部门报送给我的情况反映和典型案例来看，信访机构可以说是反映社会动态和干部群众呼声的重要窗口，是接待和处理信访的前沿阵地，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中，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为了充分发挥信访渠道的作用，要认真解决好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要提高各级领导对加强信访工作，抓紧落实政策的认识，统一思想，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为此，省委多次召开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信访工作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集中一段时间和一定力量，抓紧处理来信来访问题，认真落实有关政策。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同志非常重视干部群众的信访和落实政策的工作。仅1983年，我看到的耀邦同志对这方面的重要批示就有七八件。他批示的主要精神是：抓落实政策，“要有最大的务实精神，最大的魄力。”“要一个一个地方检查，发现一个解决一个，有些典型，要发通报。”“要大力加强检查督促，发现和解决具体问题，少作不能解决问题的一般号召、通知和规定。”对不认真落实政策的现象，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在一件批示中指出：“一些地方排斥知识分子，是非不分，甚至到了颠倒黑白的程度，真是触目惊心，我主张查一百个事例，处理后教育全党。”他还指出：“人事组织部门确有些工作极端马虎，鄙视知识，不学无术的人，组织部门、人事部门不引进一大批热衷四化，积极上进的优秀干部，并坚决把某些不称职的人调走，我看要打开组织、人事部门的新局面是困难重重的。”习仲勋同志也深刻地阐述了做好信访工作、认真落实政策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这绝不仅仅是一般的具体工作问题，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是一件大事；它绝不仅仅是解决少数有关人员的

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调动和发挥千千万万人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问题;也绝不仅仅是改善某一个地方、部门和单位的党群关系的问题,而是关系我们整个党、政府的声望和信誉,关系到国内外的政治影响,并关系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指示,对于提高我们各级领导的思想认识,增强领导决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一个是要充实信访队伍,健全信访机构,特别要重视提高信访干部的素质。搞信访工作的干部不仅要熟悉各方面的政策,更需要有一个满腔热情地为群众服务的态度。只有关心群众的疾苦,理解群众的心情,才能不怕麻烦,不把处理群众的来信来访看成是额外的负担,而且会把来访的群众看成是送上门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同时,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受“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束缚。因此,各级党委都认真组织信访干部学习《邓小平文选》中关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等文章,并经常组织他们交流工作情况和经验,从而使信访干部能深刻地认识到,平反冤假错案和复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主要阻力来自“左”的思想。如果坚持“两个凡是”,大量的政策问题就不可能落实。只有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增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意识,才能解决好落实政策的问题,才能实现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这些指导思想的明确,对于提高信访干部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加强信访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还体会到,大量信访问题的

处理,必须建立“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制度。因此,从1981年开始,全省有33个县(包括地、市)建立了党政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日制度,推动各级主要领导定期接待群众,直接听取群众意见,亲自处理信访问题,从而显著地加快了落实政策的进度。至1989年,我省比较彻底地平反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较好地处理了24批历史遗留问题,约为100多万人落实了各项政策。此后,信访数量日趋减少,每年一般稳定在5万件左右。

通过信访渠道,促进政策落实的效果十分明显。一是纠正了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许多的思想理论是非,为广大干部端正思想路线,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因为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清退“文革”中被查抄的财物等政策的落实,实质上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的纠正。这些都有利于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解放,使他们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二是为各级领导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许多党政负责同志反映:粉碎“四人帮”初期,信访数量空前增加,许多群众成批上访,我们是上班有人找,出门有人跟,回家有人等,哪有功夫去搞调查研究、做好工作?以后政策落实了,逐步做到政通人和,安定团结,我们的精力才能集中到抓现代化建设上面来。三是为端正党风,恢复与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起了积极的作用。因为信访中反映的问题,大量的的是十年动乱期间造成的,有的是过去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也有不少是干部作风方面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处理好这些问题,对于端正党风,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形象,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关系极大。群众往往是从解决一个一个的信访问题中,看到我们领导作风的改进,体会到我们党风的好转。因此,那几年的信访工作,对于拨乱反正,